

BI YE
LUN WEN
XUAN JI

毕
业
论
文
选
集

1983

河北师范大学

目 录

中 文 系

司马迁受刑原因辨.....	学 生	郑连保	(1)
	指导教师	吴国宁	
试论高尔基作品中的流浪汉形象.....	学 生	刘树辉	(7)
	指导教师	李永瑞	

政 治 教 育 系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学 生	崔艳明	(16)
	指导教师	孙福田	

数 学 系

复变函数论中席瓦尔兹引理的推论.....	学 生	杨万利	(22)
	指导教师	陈 月	
Some Properties to the Function That Has Limited Limit at Every Point.....	学 生	杨禄山	(35)
	指导教师	黄 沙	

物 理 系

对尼科耳棱镜中e光全反射问题的讨论.....	学 生	黄 楠	(45)
	指导教师	张 伟	
		吴洪莹	
电离层对电磁波的影响.....	学 生	禹志军	(47)
	指导教师	刘金印	

化 学 系

新编初中化学教材概析.....	学 生	王 颖	(55)
	指导教师	董耐芳	
应用钼的催化波间接测定头发样中磷的含量.....	学 生	梁占荣	(61)
	指导教师	王玉奎	
		张守敬	

地 理 系

承德地区合理利用土地

资源的初步探讨.....

学 生
指导教师

周灵霞
牛慧贞
杨积余

王晓东
南月省

(85)

石家庄山区热量的垂直

分布与农作物的种植制度.....

学 生
指导教师

谢俊奇
王之城

郑守立

(83)

体 育 系

浅谈短跑初学者的速跑与摆臂训练.....

学 生
指导教师

谢景福
刘建刚

(83)

生物系论文摘要

用“引导、自学、讨论、总结”的方法进行初中

植物学几章教学的试验初报.....

学 生
指导教师

王淑艳
付尊英

田 纲

(101)

鸭梨从授粉到受精的胚胎学观察.....

学 生
指导教师

李 力
王化民

(102)

不同氮水平下冬小麦叶绿体中甘油醛—3—磷酸

脱氢酶活性的变化.....

学 生
指导教师

魏称良
章欣
冯福生

危福臣

(103)

缩节胺(P I X)对棉花幼苗

及生长酶的影响.....

学 生
指导教师

李 琨
曹宗德

张秀丽

(104)

不同纬度地区的大豆短日照处理对氧化物

酶同工酶的影响.....

学 生
指导教师

王桂霞
李云荫

郭继红

(104)

不同发酵条件下主要产气菌

菌群消长规律的研究.....

学 生
指导教师

王晓健
马黎筠
马文元

王 方

(105)

中华大蟾蜍(Bufo bufo garzarizans)胚胎发育

——着重发育时程的观察和研究.....

学 生
指导教师

王 燕
王 昌

李 琼

(106)

大清河水系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学 生
指导教师

任振义
张福群

郭云秋

叶文道

(106)

大清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报告——淡水

无脊椎动物部分.....	学 生 指导教师	安瑞永 朱东晨 张 奇	贺占云 (107)
石家庄地区猪体寄生蠕虫调查.....	学 生 指导教师	王志耘 谢庆平	杨晓玲 (107)
几种中草药对家兔离体小肠运动的影响.....	学 生 指导教师	张运东 田 纲	张石明 陈弄虹 (108)
玉米、小麦外植体愈伤组织的诱导及分化 机理的初步探讨.....	学 生 指导教师	郑素玲 周彦春 沈银柱	倪 珙 (109)
蟾蜍搔拂条件反射中枢的探讨.....	学 生 指导教师	宗树伶 田 纲	徐大为 (110)
早期非特异强化亮(暗)环境对小白鼠 迷路学习的影响.....	学 生 指导教师	吴 峻 陈弄虹	田 纲 (110)
大豆生长过程中核酸含量的变化.....	学 生 指导教师	张路平 王大鸣 王友爱	岳国华 (112)
营养和环境对小白鼠生长发育和 学习记忆的影响.....	学 生 指导教师	崔兴国 田 纲	张改华 陈弄虹 (113)
T型杂交小麦及E型雄性不育系统 酯酶及淀粉酶同工酶的初步分析.....	学 生 指导教师	高丽萍 刘植义	俞肖燕 (115)
人胎儿和几种动物心脏营养血管的供应.....	学 生 指导教师	毛庆海 孙中玉 白文志	张广仲 (116)

司马迁受刑原因辨

中文系79级 郑连保

指导教师 吴国宁

司马迁是我国和世界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以广博而渊博的学识、敏锐而进步的思想，不阿不媚的铮铮铁骨和精湛的创作艺术著称于世。受腐刑是他著述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弄清这一问题，对我们认识作家、把握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仅就作者受刑的原因，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一般都认为与李陵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但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这样下结论。司马迁受刑，并不仅仅与李陵事件有关，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汉武帝存有尖锐矛盾有关。

李陵陷入匈奴之后，汉庭在李陵是否已经投降匈奴的问题上，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司马迁认为李陵是一个“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人，是一个“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赴公家之难”的“奇士”，是一个“具有国士之风”的人。从其个人的思想品德和家世看，投降匈奴是不可能的。而朝中那些“全躯保妻子”看风施舵的人，在李陵陷入匈奴之后，却立即改变了态度，把李陵初入胡地进展顺利时的“奉觴上寿”，交口赞誉，换成了下井投石，“媒孽其短”，说尽了李陵的坏话。并且认为司马迁之论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是“诬上”。李陵陷入匈奴之后，是否立即投降了匈奴呢？这问题直接关系着司马迁对李陵的认识问题，而且也关系着司马迁如何看待投降变节的大问题。当汉庭正在辩论之时，李陵是否已经投降了匈奴呢？关于这个问题，《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是不同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李陵与匈奴八万骑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战之后，“陵军五千人，兵矢即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来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军乏而救兵不至，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汉书》的《李广苏武列传》中则说：“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杆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后汉遣使之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在这两段记载中，一说李陵在战场上就投降了匈奴（由此可以看出他人对司马迁著作修改的痕迹），一说在刻薄寡恩的汉武帝杀死了李陵全家之后，李陵才投降了匈奴（当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投降，都是对祖国的背叛）。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当时为李陵“辩护”不仅没有错，而且可能有更深的用意。

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其本看法是：认为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考虑不

周，没有考虑到李陵叛汉对国家民族是个人大节问题。基本上都是同情司马迁的不幸，而否定辩解的内容。中国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基本持这种观点；翦伯赞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是这种观点；在司马迁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季镇淮先生，也在他的《司马迁》一书中说：“司马迁那时没有考虑到李陵叛汉的严重性，只是有报不平之心。”也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辩解是不能原谅的。如胡佩韦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司马迁和史记》一书中说：“当李陵北击匈奴，兵败降敌时，他（司马迁）没有认识到李陵叛汉的严重性，也没有认识到对于国家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人的大节问题，仅仅片面地从李陵和同僚们的关系好坏方面来考虑，所以当武帝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他便以自己对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然而却是错误地为李陵声辩了一番，希望武帝在李陵往日的功劳上，不要深责他。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是在打击李广利，开脱李陵罪行，深为不满。司马迁就这样触怒了武帝，被他下了监狱。这时他平日的朋友亲友，谁也不敢出来营救他。”按口气讲，胡先生认为司马迁的受刑，大有罪有应得之意。

我认为如上这些观点，都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持这些观点的同志，都是根据《汉书·苏武传》中有关李陵的记载，认为李陵是一个头脑中充满了名扬四海思想的人，而且一定要扬名于人前。认为这种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叱咤风云，奋力一战。但一遇挫折，命道危绝，便会软下来，以至投降变节。因此推测李陵战场变节是难免的，而这样推测又和《史记》记述相吻合，故李陵战场变节问题似乎就成了定论。也正是由此导致了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评价上的片面。除此之外，造成这样片面性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都把司马迁替李陵辩护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没有把它放在当时社会背景和官僚帝王之间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只看到了表面的，最直接的因素，而对于潜在的、间接的因素则重视不够。我认为司马迁受刑，是有着深广的社会背景的，是司马迁和汉武帝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而李陵事件只不过是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

就胡佩韦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来说，我认为是很不全面的。首先，司马迁并不是“仅仅片面地从同僚关系的好坏关系来考虑”，而没有认识到叛降是个人大节问题。他是从李陵平时的操行表现上，认为李陵是不会真心叛汉的。司马迁不仅当时这样看待和评价李陵，就是在几年以后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其实这并非仅仅司马迁一个人这样看待李陵，在武帝的印象中，李陵“亦有李广之风”。李陵身陷匈奴一年后“上悔陵无救”，因此派人到匈奴查问李陵的情况，而且在派遣使者出使匈奴时，也没有忘记打听李陵的消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也不认为李陵真心叛汉降匈，否则，他就不会如此用心了。关于李陵为匈奴教兵的事，《汉书·李广苏武列传》说：“其后，汉遣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另据《汉书·李陵与苏武书》：“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于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由此可见李陵降匈变节是有曲折的。李陵变

节固然不可原谅，但这确实是因为武帝冤枉了李陵，杀了他全家，把李逼向匈奴一边的。但这与司马迁当初的辩解是毫无关系的，而且说明了司马迁对李陵平时的印象和陷匈后的估计都是正确的。怎么能说司马迁没有考虑变节降敌问题呢？！

另外，胡先生认为司马迁获罪是因为司马迁“坦率地，然而却是错误地为李陵声辩了一番”“而触怒了武帝”。这样说从表面看似有些道理，但并不确切，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武帝给司马迁治罪，并不完全在于司马迁“推言陵功”为李陵辩解，而是在于“沮贰师”和“诬上”。那么，这“沮贰师”和“诬上”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我们知道，这次伐匈奴，李陵是偏帅，而主力大帅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率军三万骑，根本没有找到敌人主力，徒劳往返，无功而还。司马迁极力宣扬偏帅的苦战之功，自然而然地就冷落了汉武帝的宠臣李广利，这便是所谓“沮贰师”。司马迁既然反复伸张李陵陷匈奴是不得已，那么责任在谁呢？当然只能归为武帝考虑不周：一是给兵太少，而且又是步卒；二是没有派兵去接应，以致使这只仅有五千人的小部队孤立无援。但他们与匈奴八万骑兵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这已是了不起的功劳了，还能让他们怎么样呢？可见李陵败军的责任自然而然地归到朝庭这方面来了。这就是所谓“诬上”。就按胡先生的观点，即使是司马迁对李陵变节问题考虑不周，那么这“沮贰师”和“诬上”不都是事实吗？又何错之有呢？这不正是司马迁不看风驶舵，实事求是、不媚不阿精神的表现吗？

我们不妨再把问题深究一步。司马迁“推言陵功”与“沮贰师”、“诬上”，从逻辑上来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武帝却又听者有心地进行这样的推理呢？这本来可以按起职失言来治罪，为什么却要以这样的罪名大动肝火把事情闹大呢？这也是武帝不得已。实际上“沮贰师”和“诬上”后面，还有着更深远、更复杂的内容。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对李广利及在李广利问题上对他的不满，不是仅因自己对李陵的过错引起的，而是触动了他的裙带政治。武帝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年前的大宛之役。伐大宛的目的，不能不说没有汉王朝的战略考虑，但更多的是出自汉武帝物质利欲和扩张雄心。而派李广利为“贰师”，又完全是为了让李广利封侯，以博得宠妃李夫人的欢心。这场战争连年累岁，劳民伤财。第一次“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结果大败而归。武帝下令坚闭玉门关，不准放进一个残兵败将。接着，又“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驴、骡、橐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等这支军队回来时却变成了“计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何以失败如此之惨呢？“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从此物故（死亡）众”。这样一个误国误军的李广利，还是被封为海西侯。司马迁是这些事情的目睹者，对这样的事怎能不气愤呢！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特别地歌颂了李陵的爷爷李广的高尚品德。同时写出了这位品德高尚、名镇边关的将领不但不被朝庭重用，最后竟被活活地逼死了。司马迁给李广作传，并且和与武帝有裙带关系的，一直是青云直上的卫青、霍去病的传记放在一起对照来写，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是同情李广，并借此遣责卫青、霍去病及其背后的靠山汉武帝，另一方面则是以此批判那些不爱士卒、平庸无才、专靠裙带关系封侯拜爵的人（李广利就是其中一个），以及信任提拔使用裙带将军的后台汉武帝。从这个角度看，“沮贰师”与“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涉及到了汉武帝政治的一个局部。汉武帝不是傻瓜，尽管司马迁

再三辩白没有“诬上”，没有“沮贰师”，但司马迁的用意还是没有遮掩住。而这一点正是武帝最敏感而又最怕人揭穿的疼处。而司马迁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触痛了汉武帝，因此获罪也就成了必然的了。

如果仍把这些看成司马迁受刑近因的话，那么司马迁受刑还有更潜在的、间接的远因，司马迁开始《史记》的著述是在四十二岁，此时到李陵事件发生，还有六、七年之久。在六、七年中，虽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草创未就”，但基本的结构、体例，思想内容和部分篇目，可以说已基本完成。在《史记》这一部分的写作过程中，武帝曾经读过一些篇章。据《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帝怒削而去之”。这一记载说明，在李陵事件之前，武帝不仅已读过了《史记》的个别篇章，而且对司马迁已有怀恨之情。因之，对司马迁的处境来说，可以说是已埋下了祸种。

一般来说，阶级社会的史官，是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工具。但作为一个正直的史官，则要忠实于史事。因此正直的史官，常常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如公元前五四八年，齐大夫崔杼把国王杀了，齐太史便在史册上写道：“崔杼弑其君元”。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二弟又照史事直书，崔杼又杀太史之二弟。新上任的史官，写历史时仍坚持直书史实，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了，便拿着竹简准备按照史实直书，半路上听说已经写成才返回家中。这种依史事直书的良史精神，对后世是有深刻影响的。司马迁出身在史官世家，尊重史实，不溢美，不隐恶的治史精神对他当然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他在《史记》的著述过程中，对历史的变迁，功业的成败，尤其是对当朝政治的得失，无不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从《史记》中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法律道德等方面，都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意识。

在政治上，司马迁极力推崇“政令宽缓，生息养民”的政策，而反对残暴的政治。他十分赞赏汉初“清静无为”的政治，极力批评汉武帝的“多事”政治，尤其是反对武帝穷兵黩武的政策。汉朝是紧接秦朝之后的第二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的兴起，从秦穆公霸西戎算起，长达四百年之久。统一的秦帝国的诞生，不仅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它的产生，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但是，由于这个王朝在统一天下之后，推行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无当，赋歛无度”的政策，（《过秦论·中篇》），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所以，这个仅存十三年的封建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青天霹雳中，很快地灰飞烟灭了。汉初的统治者目睹了这一现实，所以刘邦得天下之初，就命大臣陆贾总结“秦所以亡天下的原因”。陆贾认为：秦王朝所以迅速灭亡，是因为“事逾繁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逾设而敌逾多，秦非为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之故也”（《新语·无为》）。陆贾的理论虽不尽正确，但它确与汉初采取以轻徭，薄赋、节俭、省刑为中心的“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确实使汉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经济空前繁荣，国力达到了强盛的顶点。十六岁的汉武帝，于公元前一〇四年登基，但由于他对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已经淡漠，而且又继承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基业，因此，他只看到了汉帝国目前的强盛，而未曾考虑隐伏着的矛盾。于是好大喜功的思想便油然而生。他觉得清静无为的政策已不适用。于是就在窦太后驾崩的哀乐声中，便

将黄老之术斥出了历史舞台。而且为了宣扬声威，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掠夺战争和各种建设事业。这种多事政治，不仅使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且使汉帝国和四夷的关系也都紧张了起来。司马迁的政治观点，与汉初的“清静无为”的政策是相吻合的。他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史学家，他能把古代帝王功业成败的历史作为借鉴，对当朝政治提出自己的看法吗？能不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倾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中去吗？能不为了汉王朝的利益，对汉武帝的政治进行批评吗？因此，他借汲黯之口，批评了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作法，指出了武帝“多欲”喜功，造成天下事烦、民赋加重的事实。例如：“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巨百万。府库益虚”。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赋税即竭，就不足奉战士”。元狩二年，赏来降者及有功之士，“费凡百余巨万”；“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元狩四年，“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不足与焉。是时财匱，战士颇不得禄矣”。另外，司马迁还在《平准书》中，指出了武帝“内多欲”的结果：引起了整个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和政治的腐败。文中说：“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起，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通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乃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劳其苦，而干戈日滋”。由此“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此始也”。司马迁从喜功多欲的政治现实中，看到了秦亡的影子。正因为司马迁尊重史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了些真话，才引起了武帝对他的怀恨。当然，司马迁说这些话，是为了汉王朝的利益，是站在汉王朝一边的。不过，汉武帝未能理解司马迁的用心，只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揭露和不满，这就决定了司马迁在适当的时机将被横祸的结局。

封建时代，批评皇帝，尤其是当朝的皇帝，是十分危险的事。作为求实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了无畏的精神和可敬佩的机智。例如，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是一个生有神异，豁达大度，宽厚爱人的真命天子。但在其它篇章中，则揭露了他的许多过失：彭城之役，刘邦为了逃命，不念父子之情，推儿子（孝惠），女儿（鲁元）于车下；项羽欲烹太公（邦父），他却说：“则幸分我一杯羹”；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见《项羽本纪》、《夏侯婴传》）；解儒冠溲溺（见《丽食其传》）；骑周昌项（见《张丞相传》）等描写中，从各个侧面揭露了刘邦的残忍自私、贪财好色、轻薄天礼的无赖相。司马迁写《史记》对刘邦使用这种手法，就是对汉朝的任何一个皇帝，也都是肯定某些功业的同时，对其缺点和过失不曾留过一点情面。例如：文帝的“隐忍”，景帝的“刻薄”也都历历如绘地写了出来。就是对于“今上”汉武帝的写法也没有例外，并且在揭露方面更加尖锐。例如在《封禅书》中，揭露了武帝屡次求仙，屡次受骗但又不肯罢休的昏庸愚昧；在《酷吏列传》中，则指斥了汉武帝“其治如狼牧羊”、专用爪牙，残害官民；在《循吏列传》中，描写的都是春秋战国时人，而没有一个汉代人。这就批评了武帝专门任用酷吏的残暴行为。司马迁为了汉王朝的巩固，大声疾呼：“治理国家在道德而不在严酷”。司马迁的这种“不溢美，不隐恶”的“实录”精

神，使武帝大为恼火。而且对司马迁恨之入骨，总想寻找机会给司马迁治罪。从这一角度讲，这就是司马迁获罪被刑的远因，而且是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司马迁倾注在《史记》中的政治见解和好恶感，在平时的言行中是不会没有表现的。可以这样认为，武帝“怒削”《史记》，是司马迁将被治罪的缘起，而李陵事件则不过是治罪的借口罢了。所以笔者认为，不能把司马迁受刑简单地归为李陵事件，而应联系司马迁的政治态度以及与汉武帝的种种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司马迁受刑的真正原因，才能正确地认识作家把握作品。

试论高尔基作品中的流浪汉形象

中文系79级 刘树辉

指导教师 李禾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是带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步入文坛的，他用自己的笔战斗了一生，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增添了许多宝贵财富，成为“无产阶级的最杰出的代表”。（1）

高尔基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活动的，那时正值俄国革命运动前夕，群众思想动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高尔基敏锐把握了这一时代特点，以他为探索革命道路两次徒步漫游俄罗斯时在底层生活中所积累的痛苦的生活经验、以及他所看到的“可以恢复光明的人类生活这一难以摧毁的希望”（2）为基调，在自己的作品中狠揭资本主义的罪恶，揭示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反映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唤醒人们为斩断专制统治的锁链、为争取人类自由而斗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畸形的、精力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冷酷的、充满猜疑的暗晦的日子里，我们的责任就是纠正它……千方百计使它变得更有理智，更有生气，更丰富”。（3）这是他早期创作的思想基础。

高尔基的创作是以浪漫主义开始的，但当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逐渐深入时，他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他直接植根于现实，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描写底层人民受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痛苦和极少的欢乐，以及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以此来反映在俄国革命前夕人民群众如何觉醒，并走上反抗道路的过程。

作者在早期的描写下层人们生活的作品中，大多以流浪汉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他把失业的工人、失去土地到城市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及一贫如洗的流浪汉写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他从这些活生生的材料中，选取了最富有才能和充满生气的人物，使他们成为被压迫群众的代表者，尽管这些人还不是生活中的“新人”，但他们是愤怒的体现者！从他们身上，我们可看到新意识的萌芽及由此引起的生活态度的变化，感触到当时时代脉搏的跳动。

翻开俄国历史，我们可见高尔基所描写的流浪汉题材作品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工业危机把大批失业者抛到街头，日益严重的农村贫困化也把那些贫瘠土地上的农民排挤出来，在俄罗斯城市、集镇中到处可见流浪的人群，他们在码头、货摊、木筏上谋求一线活路，栖身于破烂的板棚、废弃的车箱及库房、街头等地，他们靠每日所得的几个钱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还得忍受和躲避政府当局的迫害。这些人尽管在名称上不尽相同，实质上都是“流浪汉”。沙皇政府深知这些人心中的愤懑情绪，对这种日益增长，一触即发的势力异常担心，便开始了对失业者和

广大贫民的讨伐，动辄把无身份证、身世不明者抓进监牢、毒打、罚做苦工、流放西伯利亚……当局的迫害、饥寒的威胁、终日的流浪，使流浪汉们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尝尽了人世艰辛。同时长期的流浪汉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对统治者怀有强烈的憎和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备受压迫的反抗者。

那么，高尔基为什么描写流浪汉呢？

这是因为作者对郁抑而又沉闷的小市民剥削者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仇恨，而那充满苦楚又蕴含了反抗情绪的流浪汉生活引起了他的沉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流浪汉是些‘不平常的人’”；（4）如果我们必须谈谈神圣的东西——那么只有人对自己不满和他想使自己变得比目前情况更好的愿望才是神圣的”。（5）这就是作者写流浪汉作品的出发点。

高尔基在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真实感人的流浪汉形象，在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中，有的虽身处逆境却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的被逼走投无路，以凄惨处境控诉万恶的专制统治；有的身处底层敢于反抗“生活的主人们”；有的逐渐觉醒、渴求理想的生活；有的在屈辱的环境中保持了人的尊严；有的渴求知识、不屈不挠探索革命的真理……现分别加以分析如下：

叶美良·皮里亚伊（《叶美良·皮里亚伊》）（6）是作者所塑造的第一个流浪汉形象，他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怀有刻骨仇恨的沦落人。他虽年轻力壮却找不到活干，四十多岁了“还没有一个家”，从生下来就挨饿”，生活“比狗还不如”；苦于生活所迫，准备抢劫富人，却遇一失恋而准备投河的女子，出于同情，他耐心地劝她活下去，终于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而当女子看他处境不好而提出报答时，他“却无论如何想不到钱上来”。

叶美良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流浪汉形象，尽管生活压迫他，生活没有着落，但他保持了善良的心地，对素不相识的女子肯于救助，作者着力写出他身上的可贵的品质。

同类人物还有谢马加（《谢马加被捕记》）（7）和阿库莉娜奶奶（《阿库莉娜奶奶》），（8）前者在四处逃躲警察追捕过程中，遇一弃婴，他赶忙抱起暖在怀中，忘却了自己处境的艰险，结果被警察逮住了；后者是一老妇人，有名的好心肠，她终日沿街乞讨，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并不企望日后有什么报答。最后她冻饿而死，即使弥留的最后一刻，还把自己平日积攒的以备买棺木的三个卢布送给了众人。作者对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冷漠的描写，而是倾注了深厚的炽热情感，并肯定了这些人物的可贵品质；谢马加被迫成为偷儿，但存自己面临被抓的关键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婴儿的生命，人的本性，善良的品质在这个“贼”身上显示出来了；阿库莉娜活着时一心为众人谋利，弥留之际也不忘大家，惟独想不到自己——在作者看来，无论一个人处境多么低下，尽管他没有社会地位，但只要他心灵中仍然保持着劳动者善良的品质，他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这是作者肯定流浪汉善举的基本出发点，并以此塑造了他笔下的人物。

作者在小说《有一次，在秋天》中曾经写道：“饥饿者的心灵总是比饱食者的心灵更美，更健康”。（9）这是对流浪汉的高度赞美！

高尔基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流浪汉的高贵品质，还借流浪汉的悲惨遭遇控诉了专制统治的罪恶，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指出是社会的残酷现实使人产生了恶行。

阿尔希普和廖恩卡（《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0〉是祖孙流浪汉，讨了十年饭的爷爷深知人世的艰辛，为养大孙子，他领着孙子从家乡逃荒出走，到处流浪，为给孙子攒几个钱以至自己死后使孙子能少受点罪，他违心偷了一个小女孩的头巾……这一切当然仅仅是为了生存，然而结局却是凄惨的，祖孙俩一块死去了。

盐场上的流浪汉们（《盐场上》）干的是“苦役般的活”，〈11〉得到的只是微薄的收入，残酷的生活环境逼得人们早已对生活绝望了，每天寻找刺激，欺侮外乡新来的人取乐。作者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环境如何损害着人们的精神，以及在道德方面如何摧残着人们，人竟然成了“野兽”！

马斯洛夫（《两个流浪汉》）是个心地善良的人，〈12〉他看不惯同伴斯捷波克的诈骗偷窃行为，他只知老老实实地干活，由于他原为工人，深受剥削之苦，所以对所有的机器他都憎恨至极，最后由于对生活的极度憎恶和绝望，在同打麦机的愚蠢较量中丧生。作者借马斯洛夫之口说：“人，卑鄙下流，贪心——每个人都打算吸你的血”。这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

还有雷日克（《我跑掉了》）〈13〉安娜和戏子（《底层》）〈14〉切尔卡什（《切尔卡什》），〈15〉他们都是千千万万流浪汉中的普通代表。前三人在黑暗的混浊社会现实摧残下有的投河、有的病死、有的绝望而自杀。他们的死无疑是对社会的强烈控诉！切尔卡什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在他同加弗里拉的矛盾冲突告一段落时，他对加弗里拉说：“别害怕”，不要因差点打死我而不好意思，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谁也不会来追究的”。——这是多么凄凉的处境啊！短短一句话道出了成千上万流浪汉的悲惨下场！作者特意在小说结局写道：“在这荒凉的海岸上丝毫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以令人想起这两个人之间展开的一出小小的悲剧”。作者从实质上道出了普通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和地位，指明资本主义社会像海浪和暴风一样无情地吞噬着劳动者！这些流浪汉的凄惨遭遇多么令人同情！作者正是怀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义愤、深恶痛绝，写出千万流浪汉的不幸遭遇来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使人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进而起来反抗现实、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是的，有压迫必然产生反抗，高尔基热情塑造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者形象，切尔卡什可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切尔卡什是一典型流浪汉，他具有十分复杂的性格，即使在阴郁沉沦的生活中也没有扑灭他身上那敢于蔑视一切的怒火和敢于反抗现实的叛逆精神。他是一个血气方刚、富于热情善于行动、机灵大胆、有勇有谋的人，苦于社会现实所逼，不得已成了“贼”，这也正是他反抗的一种方式。表面看他冷酷无情，敢于冒险，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仅同情加弗里拉的处境，也常常为自己不得已走上行窃的路而深感良心不安，尤为可贵的是在他身上有着对资本主义“金钱万能”、“金钱至上”，的根本否定的叛逆精神。他不顾一切，追求的是自由，而不是舒适的生活和大把的钞票。这种对“金钱万能”的根本否定是作者所着力歌颂的。

加弗里拉是与切尔卡什相对立的人物形象，加弗里拉是个农民，是为发财而到城市里来的，在切尔卡什眼中，他是“五个戈比就会出卖自己”的庸俗小人，是为切尔卡什所不齿的人。无疑加弗里拉是个中“金钱至上”毒很深的人，在他看来，有了金钱就有了一

切。因此，为了能获得金钱，他同切尔卡什一起行窃；为了金钱，他不惜屈辱哀求切尔卡什多给他钱；也同样为了金钱，他可以一反平时的懦弱胆小而图财害命！至此，一个小私有者的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作者在此正是通过这个形象深揭了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腐蚀性，正是“金钱就是一切”驱使着加弗里拉的所为。相比之下，切尔卡什的形象是十分可贵的，在资本主义崇拜金钱的丑恶环境中，他追求的只是自由，并采取了“偷窃”这样的特殊反抗形式。对于冒生命危险所得到的金钱，他可毫不吝啬地送人，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拜金”的影子，他为自己的尊严和自由而自豪，对金钱则持极端的蔑视态度，继而反对崇拜金钱的加弗里拉也看不起。这种敢于反抗、追求自由、蔑视金钱的行为是很可贵的，也是作者所肯定的。

高尔基曾强调：“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于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16〉列宁也在“文明的野蛮”中指责资本主义：“它积累了许多财富，然而又把变成这一财富的奴隶”。〈17〉作者正是利用加弗里拉形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指出了使人丧失人性、沦为奴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本质，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思想的腐蚀性。

还应指出的是：尽管作者肯定了切尔卡什的敢于反抗的叛逆精神，却未把他理想化。作者指出切尔卡什不是新生活的建设者，他虽然摆脱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的束缚而获得了自由，但他同时失去了社会地位，而他自己又不敢正视自己是在社会上无用的人、是被生活所唾弃的人这一事实，所以他的反抗是很无力的。

同类形象还有雷日克，他不堪忍受警察的迫害，用跳河自杀这种奇特的形式来反抗专制统治的迫害，无疑也有一定的意义。还有退役骑兵大尉库瓦而达（《沦落的人们》）〈18〉为首的流浪汉们，同警察局长及其庇护下的商人的斗争，他们敢于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甚至当着警察的面，他们也痛打商人……虽然结局是失败了，但却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嘲笑”〈19〉的态度。

高尔基很赞赏流浪汉身上的反抗情绪，他真实地表达了即使是被资本主义社会遗弃的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迫害，以此唤醒人们的觉醒，推翻专制统治。

如果说切尔卡什等人的反抗还很软弱，也无生活目的的话，那么柯诺瓦洛夫（《柯诺瓦洛夫》）〈20〉和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夫妇》）〈21〉的觉醒和反抗则有了进一步的意义。尤其他们不满现实，不愿过平庸的生活而逐步觉醒，继而用实际行动探索和追求理想的生活，就更具有了新的意义。

柯诺瓦洛夫是个典型的流浪汉。他爱劳动肯吃苦，有高度的同情心、正义感，他在流浪生活中看出了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现象，热切盼望出现一种符合人需要的生活。他渴求知识，渴望找到一种“教人怎样生活的书”，他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意义，明白应如何生活的道理，但他却找不到答案，看不清黑暗的现实社会逼得他无路可走这一事实，不明白恶劣的环境才使他穷困潦倒，到处流浪，不承认自己“是生活环境和条件的牺牲品”，结果经长期探索而无益，失去了生活的力量，为摆脱苦恼生活而走上了自杀道路。无疑柯诺瓦洛夫是精神一新的人物，与切尔卡什相比有更深的意义，他不满自己的无聊生活而积极探索生活的真正意义，并敢于有所追求，这是应首先肯定的！只是由于旧的精神枷锁的束缚，使他无法寻求到生活的理想而走上了绝路。

相比之下奥尔洛夫的形象又高于柯诺瓦洛夫，他反抗社会制度的思想更为明确，眼光更为敏锐。奥尔洛夫是个鞋匠，因不满平庸的生活而又看不见生活出路而意志消沉，并沾染上许多不良习气：酗酒、打女人等，当霍乱流行时，他认为生活有了起色，他为有了献身事业的机会而兴奋，紧张而又冒险的工作迅速一改他平日的精神面貌，夫妇都投入其中了。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医生为治好每个病人而高兴，结果却不过是把他们重新抛入那种比霍乱更可怕的生活当中去；人们奋力抢救病者，而“那些健康的人却因为生活的压迫而在死亡”。于是他幼想着出现一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荒唐局面的生活，但他又看不见这种可能性，于是他的精神又崩溃了，陷入了更深沉的苦闷之中。最后因不满和抗议这不合理的生活，他又投身于流浪汉队伍中去了。

柯诺瓦洛夫和奥尔洛夫是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人物，作者力求表现出他们那刚刚萌发的又还很脆弱的意识与旧的精神枷锁在思想中进行着的尖锐冲突，但终因找不到目标而以悲剧结束了探索的过程，作者对二人无疑是持赞美态度的。在小说《读者》〈22〉中作者曾谈到：“生活的意义寓于美和追求生活目标的力量，而且应使生活的每一时辰都有其崇高的目的”。从这点看，尽管二人思想行为有所差异，但他们都是异乎寻常的人，他们都在苦苦思索着生活的真正意义，并用实际行动在生活中寻找使用自己力量的地方。他们那酷爱自由、渴望崇高生活的理想虽未能实现，但这是在劳动人民的社会意识觉醒过程中出现的悲剧，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觉醒的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生活信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经动摇，人们的觉醒、抗议已经开始了！

另外应指出的是：在俄国文学史中，高尔基是第一次把这新的人物形象带进文学中的人，这种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关注、表现主人公内心世界中新与旧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思想的矛盾，都极其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夕的紧张气氛和广大群众思想动荡、渴求改变现状的特点，当然这两个人物亦并非“英雄”。

在表现劳动大众的不断觉醒过程中，沙金（《底层》）是另外一类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作者的思想体现者。他首先喊出了关于人的理论，从而在不幸的流浪汉中间响起了关于人的赞歌。作者在底层流浪汉的生活描述中，不仅写了他们的苦痛生活和悲惨遭遇，更写出了他们对人的真理的认识，作者把走投无路的流浪汉生活与他们对人的真理的极力维护相对比，更深刻揭示了社会底层人们觉醒的现实意义，强调了反抗和斗争的思想。

沙金是个有知识、看问题很敏锐而阅历较深的流浪汉，在《底层》流浪者中，他是唯一未丧失斗争精神、保持了反抗性格的人，他保持了人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信念，喊出了“人就是真理”！“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是为了美好的将来才活着”！所以“一定要尊重每个人”“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这些都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甚至是作者的思想。因为人的本质是美好的，人不是为现实社会而生存的，现实社会制度对人的生存毫无保障，所以这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无疑有革命的因素。

在探索什么是生活的真理时，游方僧鲁卡出现了，这是一个阅历很深，披着温柔外衣、内心非常冷淡、早已看穿人世、是受寄生阶级所喜爱的沉沦到底层的混世虫，也是一个职业安慰者。他安慰每个人，用上帝安慰安娜，“照自己的方式忍受生活”，用谎话欺骗戏子，甚至杜撰故事说明只有谎话人才能生存，而真理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他用西伯利亚自由生活的图画引诱贝贝尔；他到处散布安慰与希望，其实他所散布的都是谎言，都

是有意识的欺骗。鲁卡的谎言危害性很大，它的反动实质在于对人的腐蚀性，使人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毫无反抗的屈服，幻想来世的安宁、用忍耐的方式同统治者和解。这实质是要人们放弃斗争，冲淡人们对现实的憎恨，导致人们行动上的妥协。特别是鲁卡打出一幅人道主义的面孔，使人不易识破，这就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危害性，因为它实质上阻碍了人民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

沙金明显看出了这些，他鲜明提出批驳：“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与鲁卡在这点上根本对立的，因为二人信奉了根本对立的哲学，二人斗争的结局是鲁卡安慰哲学的根本破产，这实质是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的结果。

但应指出沙金并非正面人物，如作者所言“剧本中没有‘真理的直接代表者’”。〈23〉沙金在流浪汉中自然较其它人富于斗争性，看问题也深刻，但他对做为一个人所应从事的真正事业是力不从心的，他的抗议实质上只限于徒劳无益的无政府的骚乱而已，当然对于他的不屈从命运，没有完全失去生活的信心，敢于否定安慰哲学维护人的真理，是肯定的。

从作者所塑造的众多流浪汉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创作《底层》剧本的真正意图：表现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的矛盾如何冲撞着底层人民心灵的过程，指明关于人的真理，以唤起人们起来斗争，寻求真正的出路。从以后效果看，作者意图是实现了的，当时的保皇派杂志《俄罗斯导报》曾在《底层》上演成功后大骂：“流浪者的头目马克西姆·高尔基用如椽之笔摧毁着这一社会赖以立足的根基，这是一个多么有害的作家”。〈24〉这，正证明了高尔基作品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强烈效果！

毫无疑问，高尔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流浪汉形象，他们之中分别显示了许多卓越的性格，比起同时代的那些“唯一志愿就是用诈骗的手段来吸取人血，把血凝成戈比，再用戈比铸成卢布”〈25〉的小市民来，他们不知要高多少倍！这些流浪汉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良品质：敢于反抗的性格、完美而勇敢的品质、纯朴真诚而又努力探索生活的真理的行为，都是那些虚伪奸诈、愚昧庸俗、伪善吝啬、贪婪自私、因循守旧的小市民之流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作者对这两种人表示了十分鲜明的爱憎！

然而，应当同时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思想认识的限制，作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所塑造的流浪汉尽管有许多善良的品质及卓越的性格，但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当作家思想也有相应提高之后，他笔下才出现了有远大前程的流浪汉的新型代表者，他笔下的人物才真正找到了生活的理想、找到了奥尔洛夫、沙金等人所不可能找到的生活的真正意义，这个人物就是阿辽沙。（《自传三部曲》）

阿辽沙是在阴暗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童年的，“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地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26〉后来随年龄增长，他进入了人间，随之他的不满现实的反抗情绪亦有所增长，尤其此时他接触到大量的书，使他开始了对生活理想的探索。后来惨酷的现实环境使他上大学的希望成为泡影，为饱肚子，只得到处流浪，

“社会”成了他真正的大学；但尽管环境不利，阿辽沙却是一个执着的追求者，在“社会大学”中他的知识面逐步扩大，伏尔加河码头工人成了他最早的老师，“马鲁索夫卡”大杂院中的青年革命者古里在生活上、思想上给了他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帮助，尤其同民粹派的

接触，使他获益非浅，“从此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着想，开始更多地去关心别人了”。

当然，阿辽沙在探索追求过程中，也有过挫折，在民粹派失败后，社会上出现了“真理就是爱”的反动思潮，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也风行一时，阿辽沙在这恶环境的包围中苦闷至极，感到绝望，于是走上了绝路……

自杀未成，阿辽沙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民粹左派罗马斯帮助下，他“体会到了一些更为新颖更深刻的思想”，他很快克服了沉闷情绪，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的追求，更努力地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阿辽沙是一个热情好学的青年，他不屈从命运，紧张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不断探索追求，积极向上，认准目标就坚定地走下去。尽管在恶劣环境中曾因找不到革命的真理而动摇过，但当从绝望中解脱之后，又勇气倍增地继续顽强地追求下去。虽然在《三部曲》结束时，他还未形成完整的先进世界观，但我们可以预见他已坚定地走上了争取新生活的革命道路，而绝不会再重蹈柯诺瓦洛夫和奥尔洛夫的悲剧！

高尔基在书中所描写的不是阿辽沙个人的成长史，小说中心不是阿辽沙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作者传记，而是高度概括的艺术典型，作者借这个形象反映了整个俄国人民的命运，阿辽沙的成长代表了十九世纪俄国一代新人的革命者的成长，这样的结局是高尔基革命前作品中所未见的。

作者在小说中写出了阿辽沙成长的复杂过程，这是忠于历史真实的。阿辽沙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是恶劣，现实是冷酷的，不可能同保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比；保尔有党的关怀引导，有十分有利的环境，所以保尔能迅速成长为一个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而阿辽沙则处于自我探索阶段，他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的成长——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阿辽沙以他极顽强的生命力积极探索、不断追求，表现了处在觉醒之中的摧毁旧生活，创造新生活力量的崛起。阿辽沙所走过的逐步掌握先进思想为争取新生活而斗争的道路，无疑是广大群众走上自由、争取解放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辽沙无愧为流浪汉形象中的杰出代表。

总之，高尔基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饱满的具有卓越性格的流浪汉形象，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流浪汉文学”。作者所塑造的流浪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在底层中备受凌辱、肉体和精神都受创伤的人，如叶美良、安娜、切尔卡什、奥尔洛夫等；一是精神上全新的人，也即作者称之为“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如沙金、阿辽沙，这些人物在俄罗斯文学中是首创的，是高尔基同他以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人物本质区别之所在；高尔基以前的作家如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也有许多描写下层人们生活的作品，也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但他们只停留在反映小人物的困苦生活，暴露社会黑暗，对笔下人物，他们也仅仅是同情，怜惜，尤其他们教导人们对生活抱消极态度：契诃夫的人物没有出线；托尔斯泰宣扬“不抵抗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信条是“忍耐吧”，因此他们的作品虽有助于人们认识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但不能指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也不能正确表现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而高尔基则不同，他笔下的人物敢于反抗，维护人的尊严，并有所追求，积极探索生活的理想，而终致投身于新生活之中，这些是他以前的作家所不可能做到的。